



全球化与 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

QUANQIUHUA YU OUZHOU SHEHUI MINZHUDANG DE ZHUANXING

社会民主党实际上面临着重大的身份危机和未卜前途。无论是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还是德国的新中间道路，都是解决这种困境的努力。但由于各党之间和各党内并未完全取得共识。因此，短期内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并没有解决。



史志钦◎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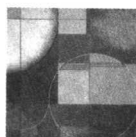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全球化与 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

QUANQIUHUA YU OUZHOU SHEHUI MINZHUDANG DE ZHUANXING

史志钦◎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史志钦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80211-555-2

I. 全...

II. 史...

III. 社会民主党-研究-欧洲

IV. D75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2149号

全球化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

出版人 和 龑

责任编辑 朱 虹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5(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960毫米 1/16

字 数 270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0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

序 言

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代世界的一大政治思潮，它反映和代表了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及其国际联合组织——社会党国际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上的基本主张，在处理政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被奉为各国社会党体系和目标模式的统称。^① 社会民主主义一词在英语中最常使用的是 Social Democracy，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指特殊的集团或者政党，一层是特指政党的目标和成就。^② Social Democracy 在中文里一般翻译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有时也可以翻译为社会民主或者社会民主党。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这种思想体系一般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这是因为 1951 年成立的社会党国际所发表的宣言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即《法兰克福宣言》。1992 年 9 月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 19 次代表大会决定，把用了四十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名称改回到“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自诞生时起，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度沉浮兴衰，成为研究欧洲政党、政党转型以及欧洲政治思潮的观察点之一。本书拟以 20 和 21 世纪之交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及其相伴随的第三条道路的勃兴为起点，全面地研究该思潮及其信奉者——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时代背景及其所受的限制。

① 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在各国具有不同的称谓，其理论体系和政策都有程度不同的细微差异，本书在谈及整个思潮时，将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主义交叉使用，在涉及各国的具体个案时，按照不同国家对其的称谓为主。

② Gerassimos Moschonas, *In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45 to the Present*,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2, p. 6.

一、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英国著名左派学者唐纳德·萨松 (Donald Sassoon) 指出, 综观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欧洲“左派政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趋同”, “工党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欧洲社会民主党”。^① 读一读过去几年欧洲中左政党的政策研究机构、政党与学者们发表的关于福利国家的文献可见, 从 1994 年英国社会正义委员会的报告到 1998 年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未来委员会关于福利国家的计划, 各国虽仍有差异, 但无疑出现了极大的共识: 既赞扬私有企业、以相同的措施保证社会公正、承诺实现充分就业而放弃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实施财政紧缩、强化公共—私有伙伴关系及其竞争, 又扩大和改进公共服务; 既下放权力、扩大地方民主, 又重新建立和加强政府关系等。可以发现, 它们的基本政策和方法十分接近。

与此同时, 欧洲左翼也在选举中突然崛起, 取得一些出乎预料的胜利。它们纷纷在欧盟多数国家中或单独组成政府, 或参加联合政府。尤其引人关注的是, 在欧盟 15 个国家政府中, 中左派政党第一次在 13 个国家执政或者参与执政, 这是中左的第一次历史性突破, 特别是在欧盟四个大国的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 中左政党第一次同时执政。于是, 所谓“红色欧洲”之说经常见诸于欧洲的主流媒体。随后, 这些政党把自己的政策主张上升为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进而成了时代的术语, 成为世纪交替之际颇为流行的一股政治思潮。中左执政以及第三条道路的风靡, 被认为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引发了世界范围的中左政治的大讨论。其领军人物当属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及其精神导师、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他先后推出一系列文章和书籍对此

^① D. Sassoon, “Fin - Siecle Socialism: The United, Modest Left”, *New Left Review*, No. 227, 1998, p. 93.

加以论述。^①一时间，第三条道路在国外被炒得沸沸扬扬，几乎是妇孺皆知，以至1999年年初美国《新闻周刊》把1998年列为“欧洲年”。

十分巧合，此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也被意识形态与欧洲社会民主党接近的民主党所统治。大西洋两岸的中左政党出现了政策的趋同，这客观上似乎为第三条道路的推广提供了广泛的空间。1998年初，英国首相布莱尔访美期间，专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讨论了第三条道路问题，二人一致同意要使之成为一种国际运动，在世界上达成一种中左共识。同年9月，克林顿和布莱尔邀请世界中左政治家及理论家集会于美国纽约，专门探讨第三条道路问题。于是，第三条道路从起初仅标志着英国工党复兴的一种产物，逐渐发展成为一股影响欧美政坛的思潮，引起世界众多国家的关注，成了一个风靡全球的政治话题。据报道，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开设了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研究生课程，杰拉尔德·多尔夫曼教授和胡佛研究所的一位学者，主讲这门名为“托尼·布莱尔的并非全新的政治”课程，课程8周，学费870美元。第一学期便有40个学生注册。^②

与此同时，1998年9月，随着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来华访问，第三条道路也被“引进”中国，着实使中国的知识界也为之激动一番。理论界举行学术研讨会，讨论第三条道路，关于第三条道路的书籍充斥于各书店的书架上，相关的评论与文章见诸于报刊杂志之中。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2002年法国总统选举，极右政党领导人勒庞（Jean-Marie Le Pen）在第一轮选举中破天荒地进入第二轮选举，把看似有希望的左派领导人若斯潘排挤出局，而早些时期，其他一些国家左派政党也相继在选举中下台。到2002年9月，社会党只在英国、德国、希腊和瑞典执政（比利时和芬兰为联合内阁）。于

^① 其中翻译为中文的包括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等。

^② *The Times*, August 7, 1999.

是，有学者得出结论，认为这标志着“第三条道路的落幕”。^①

“第三条道路落幕”论者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忽视了欧洲政治的钟摆现象。就是说，欧洲左右翼政党总会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摆，时上时下。回顾欧洲左翼的历史可以发现，二战后左翼政党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1945—1947年，是欧洲许多国家的民族团结政府（包括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左派发展时期，法国、意大利、芬兰、比利时、荷兰、奥地利、英国、瑞典、挪威等国，都出现了左派政府。处于这波左派发展潮流之外的是德国（被盟军占领）、希腊（内战爆发）、西班牙和葡萄牙（右翼独裁），随后是乏味的50年代。除北欧地区外，左派普遍退潮。60年代中期，一些国家出现了左派趋势；1964—1970年，英国建立威尔逊（Harold Wilson）政府；1966—1969年，德国出现大联合政府，接着社会民主党开始主导政府，一直持续到1982年。“从1974—1975年间，社会民主党获得了战后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全面胜利。那时候，它包揽了（欧洲）整个地区的国家政府总理职务：英国、西德、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瑞典和芬兰。”^②

此后不久，左派相继在英国和德国下台，开始陷入危机。以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权的大选胜利为起点，迅速波及到西德、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而且还蔓延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只有瑞典和奥地利顶住了这一压力。南欧的左派走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南欧左派的力量比较强大，在70年代和80年代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社会主义政党复兴，代表人物如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希腊的安德雷亚斯·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reu），西班牙的菲里普·冈萨雷斯（Felipe González），意大利的贝蒂诺·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等。

柏林墙倒塌后，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遭到失败，这本该为争斗

① 参见周德明：《全球化、“第三条道路”与2002年法国大选》，《国际政治经济评论》，2002年7月号。

② 佩里·安德森、帕屈克·卡米勒主编：《西方左派绘图》，张亮、吴勇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半个多世纪之久的社会民主党带来好运，但结果却恰恰相反。与之相伴，一连串突如其来的政治地震严重地冲击着西欧社会民主党。1993年2月，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贝蒂诺·克拉克西因被指控腐败而辞去总理职务。克拉克西是意大利80年代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曾两次出任政府总理，后为逃避逮捕而流亡突尼斯并最后客死他乡。1993年5月，法国总理、社会党人皮埃尔·贝雷戈瓦（Pierre Bérégory）在五一劳动节饮弹自杀，原因是他的个人财政问题受到新闻界质疑，并且对社会党在大选中的惨败感到失望。两周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布容·恩格霍姆（Bjorn Engholm）也因为政治撒谎而辞职、自杀。紧接着，德国最强大的冶金工会领导人、秘书长弗兰茨·斯泰因库勒（Franz Sfeikühler）也因为泄露他担任共识会劳工代表的公司内部商业机密而被迫辞职。同一时期，西班牙冈萨雷斯政府内的两名高官因为腐败而被起诉。这一系列事件对随后的选举以及社会民主党的衰落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舆论普遍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同样死亡；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反对中央计划经济、一党制及限制公民自由，但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也使其受到牵连。

鉴此，唐纳德·萨松认为多数评论家忽视了这样一种固定的历史模式：政党会经常地改变自己的政策，以适应新环境来回应危机，而且可以回应导致其变化的环境。它们必须生存下来为明天而战。保守党巧妙地躲过了农民阶级的衰落，毫无疑问，左派政党也会躲过工厂无产阶级的衰落。他们只需公开地宣称修正主义，甩掉沉重的思想包袱。80年代初，英国工党还在争论，是否“只有社会主义政策”才能阻止英国的长期衰落，法国社会党却通过在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之间实现与社会民主的妥协，形成第三条道路，进而赢得了1981年大选的胜利。在恩里科·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领导下，意大利共产党也号召在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模式之间实现第三条道路。在瑞典，社会民主党围绕迈德纳计划（Meidner）的辩论，旨在把私有部

门转换为民主控制的工人基金。^①

从某种角度来看,萨松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新的历史视角下,我们在看到社会民主主义不断修正其理论学说的同时,也要深刻地认识这次变革对欧洲政治的影响程度。众所周知,西欧的政党政治经常以连续性和稳定性而著称。20世纪后半叶,西欧一些主要政党的权力基本上没有受到新政治力量的挑战,选民也没出现较大的变化。一般而言,相互对立的两大政党或集团一直被界定为左右两翼,它们支配了政党制度。在战后欧洲政治中,左翼和右翼各自具有特殊模式,希望在经济、公民社会和国家作用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在一系列固定的政治思想和价值定位上相互挑战,但是这种基本的逻辑已经失去决定意义。有时,根本性的政治变化不会以革命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是通过渐进性的方式对某些成分进行修正。但是,传统的社会民主党改造为所谓的“新工党”或“新中间”,则标志着原有意识形态定位和政治的重大转型。第三条道路宣称克服战后西欧政治的两分逻辑,这标志着政治特性的重构,也是政党竞争的分水岭。

在这方面,新工党在英国的胜利,法国社会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以及德国红绿联盟的相继胜利,已经超出了思想形态的复兴。80年代,这些左翼政党被描述为毫无希望,落伍过时,与时代的经济需要相脱节。20世纪90年末和21世纪初,欧盟成员国政府多数由社会民主左派执政,扭转了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局面,这一事实证明的不只是这一主角的持续生命力。左翼所体现的“第三条道路”、“中间政治”或者是“超越左与右”等特征,标志着西欧政治中社会民主党的质变的一步。这些政党的理论探索起源于上个世纪末,之后虽然非议众多,争论不断,但迄今仍然继续充斥于公共辩论之中。这标志着西欧政治中社会民主党政治发展的实质性一步。现代社会民主党人所采取的政治立场与传统的社会民主政治具有很大的不同。“现代化的”社会民主党,对于如何理解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支

^① John Callaghan, *The Retreat of Social Democrac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1.

持开放市场，实现二者的平衡有了崭新定义。布莱尔和施罗德在其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联合宣言中，^① 把他们的政治规划描述为努力协调与创新，一方面既要满足资本主义现代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承诺社会公正，以确保社会团结，把相信自由市场经济的活力与确立一种新型社区特性结合起来。这标志着对欧洲左翼立场进行了极大的修正。

乍看起来，社会民主左翼作为欧洲政治中的主导力量，它的复兴及转型为新工党、新社会民主党，或者要超越左、右翼的第三条道路方法看似非常矛盾。一方面，这种转型以选举的胜利为特点，是对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挑战。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形成一种新型政治战略，旨在其传统的阶级之外扩大选民范围。与此同时，它们在放弃其多数传统思想时，也在竭力塑造新的政治特性；经历了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激进变革，改变其传统的政治特性，在政党政治中重新构造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其一系列政策建议暗示，现代社会民主党隐约地出现一种新的思想核心，这些思想称呼各异，但具有共同的特征，集中地体现为理论界最常使用的第三条道路政治。这些不同的思想术语，说到底反映的还是社会民主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转型。

二、社会民主党的周期性转型

自社会民主党诞生以来，它就不断地发生周期性转型，而且这也是 20 世纪的一个新的政治现象。回顾欧洲政治发展的左翼历史，它实际上已在政治和社会现实变化的压力下进行了几次改造。^② 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涉及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和议会民

① 布莱尔、施罗德：《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见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50 页；Tony Blair and Gerhard Shroder, “Europe: The Third Way/ Die Neu Mitte”, in Bodo Hombach,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Cent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p. 157—177.

② D. Sassoo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ern European Left in the 20th Century*, London: I. B. Taurus Publishers, 1996.

主的关系。在社会民主党内始终存在着人们熟悉而又循环往复的紧张。最重要的是，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实现建立一个体现自己理念的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在这个社会里为赢得选民、结成多数选举联盟又必须做出妥协，他们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于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为追求选票而不得不经常以放弃原则为代价，不断地遭受指责；语言与现实之间，实施改革的具体理想与总体理想之间，具体政策与谨慎的实用主义之间等，总存在着鸿沟。把思想付诸实施必然会不断地被指责背叛自己的理想，然而要启动持续久远的变化和改革进程就必须有这种转化进程。

因此，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历史始终面临这样的困难：一方面，社会民主党需要代表和捍卫某一特殊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要促进整体的公共利益。这样，在建立以忠诚和共同目标为基础的组织过程中，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就十分困难了。在整个 20 世纪，与社会民主党紧密相连的一个群体利益就是工会组织，它既是社会民主党能力和能量的源泉，又是其衰弱和无为的根源。

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特性来看，具有影响意义的是它循序渐进地但却非常痛苦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方法，承认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现实。社会民主党声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但在早期阶段，围绕着资本主义制度能否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提供合适的环境问题，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马克思主义是鼓舞工人运动的思想，但欧洲的温和左翼在不断的重构过程中，不断地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本世纪上半叶，这种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和议会民主制的协调经常导致运动的分裂，使左翼分裂为改良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其最激烈形式表现为各对立派别之间的暴力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针对冷战后世界两极化的演变和西方经济的成功恢复，社会民主党的改良派最终与自由市场经济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原则实现了妥协。^①二战结束后初期，社会民主党仍以高度的宏

^① S. Padgett and W. Paterson, *A History of Social Democracy in Post War Europe*, London: Longman, 1991, p. 1.

观经济计划和实现关键经济部门国有化思想为基础，但随后基本上演变为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架内也可以实现人道的和公平的社会远景。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标志着新型社会民主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分水岭，它们越来越怀疑自己能否有机会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改造。这样，社会民主党的改良派最终抛弃了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联系，试图利用市场经济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建设“具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灵活而又有活力的框架内，社会民主党基本上放弃了革命性变革和社会主义口号。这样，指导社会民主党处理经济问题的就是一种混合妥协原则：一方面是市场机制，另一方面是非市场原则的资源和权利再分配。

20世纪下半叶，社会民主党经常表现为矛盾的对立，在实现工人阶级解放和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现实变化之中寻求平衡。鉴于战后初期十几年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气候，西欧社会民主党人感到，他们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以根据选民的需要来组织经济。在战后社会民主党的黄金时期，他们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市场干预、扩大公民权利以及建立福利制度，渴望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走一条“第三条道路”。这种情况突出地体现在北欧国家中。这确实是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要求。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没有出现危机，反而生产力高度发展，似乎实现了各阶级之间的社会平衡。需求导向型的国家干预与完备的社会福利体制似乎成为一种神奇的模式，它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使其成为构建一个更公正、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目标的整体的一部分。^①

进入80年代后，社会民主党的这种政治理想模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压力，以至于舆论宣布了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不可逆转的结束。70年代，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及其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和国家手段，似乎在日益加剧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越来越受到挑战。随着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马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① See A. Przeworski,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Thatcher) 主义的崛起, 新自由主义理论指责社会民主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代表, 与必要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相脱节。尔后, 新自由主义经历了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的十几年霸权后, 导致社会问题愈加凸显, 这进而为社会公正和平等思想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不过, 从 90 年代以后社会民主党复兴的结果来看, 其传统的社会平等含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又依次造成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特性发生重大变化。如今, 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日程中不仅抛弃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进行选择的左翼语言, 而且还淡化了稀有资源的分配、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冲突、劳资之间的冲突, 淡化了左右之间的标志。社会中围绕资源与权力分配存在的潜在冲突, 不再是第三条道路首要考虑的参照点; 它已不再真正地关注社会不平等和权力结构, 相反却更多地关注怎样有效地管理市场经济和减少危机, 关注怎样根据英国第三条道路的模式管理经济。如有学者所指出, 社会民主党已经由过去的“对资本主义批评变成了撒切尔—里根新自由主义的特殊资本主义; 它已不再是政治要求, 而是怎么把事情办得更好的管理主义要求”。^①

“管理主义”方法在涉及福利国家改革等问题上不再简单地根据左右两极逻辑作为判断标准, 他们体现于公共政策的辩论之中; 政党之间所讨论的问题已由过去涉及社会公正的阶级问题, 转化为是真正地用“现代化”或“创新”方法解决市场失效问题。“现代化”成了所有政党的主题词, 它们无不强调自己的治理能力; 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出现, 具体的政策选择成为优先选项, 辨别政党差异的基本政治问题随之消失。当然, 作为具有选举吸引力的关键性因素, 中左政党仍把社会公平作为其竞选的核心。第三条道路旨在解决日益增加的不平等和社会紧张, 以反对运动的形式出现, 反对纯粹的市场方法, 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安全问题。社会民主党认为, 他们的纲领设计应正视现行的社会排斥及边缘化的社会集团。因此, 公正、机会

^① A. Finlayson, “Third Way Theory”,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1, 1999, p. 276.

平等以及公正等概念，对于实用主义的左翼重新执政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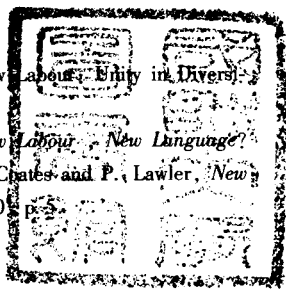
三、社会民主党的形象塑造

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每次转型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形象塑造。在这次最新的复兴中，其特征之一是以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核心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如萨松指出，“政治就像宗教一样，术语和形象始终具有重要的作用。”^① 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民主”的标签还一度是南欧社会主义者和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工党普遍使用的一个术语；如今，“社会主义”一词已很少使用；甚至易帜改名的意大利共产党也回避这个术语，先是使用“左翼民主党”（PDS），然后使用更泛化的词语“民主左翼”（DS）。但在主流的社会民主党内，左派更愿意使用一度遭受蔑视的社会民主党的词语，而不愿意使用以托尼·布莱尔为代表的新修正主义者使用的词语，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毕竟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源，有助于吸引那些传统的支持者。

布莱尔及其支持者自称为新工党。布莱尔非常强调把“新”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据统计，在 1997 年和 1999 年的 53 次演讲中，布莱尔使用“现代化”的次数，达到 87 次，而“新”字在《宣言之路》中出现了 107 次，在 1995 年工党的年会上 37 次提到“新”字。^② 实际上，布莱尔所谓的“新”并不新。一个世纪以来，有许多政治事件或现象用所谓的“新”来描述，由此造成了此术语的泛滥，如新帝国主义、新女性（妇女）、新自由主义及后来出现的希特勒的新秩序、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的新国家、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

① Donald Sassoon,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and New Labour: Unity in Diversity?” *Political Quarterly*, 1999, pp. 20–23.

② 关于现代化的使用情况，参见 Fairclough, N., *New Labour, New Langu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关于“新”的使用，参见 D. Coates and P. Lawler, *New Labour in Powe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新自由、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人们刚忘记的乔治·布什（George Bush）提出的新世界秩序以及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提出的新欧洲共识。1996年布莱尔的演讲《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与1964年哈罗德·威尔逊的“新英国”相回应。在欧洲大陆，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又出现了比利时的新现实主义者、西班牙的革新，意大利克拉克西的新改良主义者，法国1982—1983年大转折之后，社会党追求现代化，反对那些因循守旧者；金诺克的支持者更热情地使用“现代化者”。还有当今的新右派、新左派、新时代、新哲学、新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

相比而言，当今的所谓新修正主义者或新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历史。传统上，左派政党把每一个重大战略变化看做是对过去战略的继承和发展，强调的是连续性。而现在新修正主义者与过去的重大区别是，他们不再改写历史，他们更喜欢忘记历史。^①新工党不再提及金诺克（Neil Kinnock）在工党转型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法国的若斯潘（Jospin）则尽可能地更突出自己与密特朗的区别。西米蒂斯（Costas Simitis）的支持者把自己与帕潘德里欧区别开，马西姆·达莱马（Massimo D'Allema）把自己与贝林格（Berlinguer）区别开。

这些新社会民主党人不仅试图把自己与社会改革的自由传统结合起来，而且要与竞争联系起来。芬兰社会民主党领袖帕沃·利波宁（Paavo Lipponen）在输掉1991年大选后，接受市场改革，宣布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意思是说，我相信，人民由于缺乏竞争而遭受痛苦。我们需要一种真正的范式变化……”在紧接着的大选中，他赢得了胜利。1995年，达莱马宣布自己是欧洲主义者，接受自由主义政策，攻击意大利资产阶级具有国家主义的本性，期望建立一个具有“真正竞争市场”的正常国家。1998年，他出任政府总理。在荷兰，工党领导人维姆·科克（Wim Kok）领导的联盟包括亲市场的自由市

^① Donald Sassoon,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and New Labour: Unity in Diversity?" *Political Quarterly*, 1999, p. 21.

场主义政党，排挤了以宗教为基础的政党。在比利时，大选在 1999 年举行，社会党被自由党所取代后，政府是自由党主导的联盟，而不再是由基督教民主党所主导。显然，声称坚持自由改良主义传统的改革者不只布莱尔一人。^①

作为政治必要的一部分，形象塑造仍然是最具民族国家特色的交流形式之一。它毕竟是政策和身份的标志，使用的词语和符号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回响。在法国，无论是左派还是戴高乐主义者的右派都坚持共和国的基本价值；他们反对失业上升，因为失业上升不仅会造成痛苦，而且还会危害国家的社会团结。“社会团结”一词首先在法国被创造，1995 年总统大选期间，希拉克（Jacques Chirac）得以充分地利用。希拉克谴责种族主义，不仅出于道德原因，而且它还违背法国大革命的普遍原则。这样，勒庞的国民阵线就被看作是反对法国的，因为它煽动民族仇恨；反对美国则是捍卫共同的文化价值，不是左翼的特殊语言。相反，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民族主义被看作是佛朗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政治经济落后的表现；而放弃主权则引不起人们的惊愕，欧洲主义是一种进步，是现代性的核心表现。

总体上，各左派政党在趋同，但由于所处的不同环境在政策方面也有差异。这不仅源自各自的文化差别，而且还有不同的政治环境。在执政的 12 个国家中，只有希腊和英国是左翼占据主导，比利时和卢森堡则是基督教民主党发挥主导作用。许多政府是联合政府，缺乏稳定性，只有布莱尔的议会多数比较稳定。那些联合政府的国家，中左政治家不得不和左、右翼妥协。例如，在法国，里昂内尔·若斯潘的政府内有共产党人，而且与雅克·希拉克共治；再如德国，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由于其盟友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的离去而必须与绿党合作。在其他国家，如丹麦、瑞典及挪威，主流社会民主党是在左派的社会党支持下组成政府，它们仍然热衷于“税收和支出”，对欧元冷淡。在意大利，形势更是前所未有的。

^① Donald Sassoon,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and New Labour: Unity in Diversity?” *Political Quarterly*, 1999, p. 22.

复杂。马西姆·达莱马组成了根据意大利标准来看是非同寻常的政府。他的八党（或七党）联盟包括阿曼多·科苏塔领导的共产党（后来又从贝尔蒂诺蒂中分裂出来），科西嘉领导的前天主教民主党，希望取代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成为新的中右政党的领导人。^①

四、新政治的内容

社会民主转型不仅体现在形象的创造上，而且还提出一系列相似的理论口号。托尼·布莱尔把其主张冠名为第三条道路，德国的格哈德·施罗德则以新中间自称，而法国的若斯潘则自称为现代社会主义者。无论其称谓如何，某些核心政治思想和政策动因具有一些共同特征。

第一，超越阶级政治。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一个深刻动因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社会民主党意识到它们在欧洲许多国家都面临着被永久地排除于政府之外的威胁。这主要因为，社会民主党的传统选民和支持者的社会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必须应对日益消失的选举支持。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传统支持者来自蓝领工人队伍，具有相同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偏好。^②然而，最近一个时期，服务业和新经济部门已成为就业的主要领域。新型而又灵活的就业形式迅速传播，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分界线不断模糊。传统上，维护劳工集体利益、提高工资、改善社会保证、实现社会公正等这些工人阶级的议题，始终是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议程，尽管它们也开始关注其他社会集团。但是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新问题和社会运动极大地挑战了社会民主政治的传统选择。由于社会基础变得多样化，新问题不断地进入政治舞台，因此，许多政治竞选几乎决定性地集中在某个问题上，如公平问题；公民的生活经历和期望变得更加多样化，超出了社会民

^① 不久，马西姆·达莱马迅即被阿马托所取代。

^② H. Kitschelt, "Class Structure and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trateg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3, 1993, pp. 299 - 337; Peter A. Hall,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Third Way", in Oliver Schmidtke (ed.), *The Third Way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Democracy*, Ashgate, 2002, pp. 31 - 57.